

编者按 8月17日,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逝世,享年95岁。本报邀请与周光召生前有过交往的专家学者撰文,以怀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



怀念“我们”所认识的周光召

为我国基础研究“破冰”

□ 柳怀祖

20世纪70年代,李政道教授回国访问,光召同志作为年轻学者参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李政道教授的活动,与李政道教授有了交往。他们都是理论物理学家,有很多共同语言。

1986年,光召同志在瑞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与李政道教授相遇,两人经常讨论怎样让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尽快赶上去。其中最重要且马上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中国学者及时获取国际上基础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信息。

此时世界实验室恰好在日内瓦成立。光召同志和李政道教授设想,借助世界实验室的帮助,在国内组建一个学术机构,来促进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的交流,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以至快速发展。

达成共识后,在光召同志的支持下,李政道教授正式向我国领导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验室合作,在我国成立一个名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民间学术机构。

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分支机构,受世界实验室和中国政府的双重资助,中心的任务是在中国创造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较宽松的、致力于前沿性的基础研究环境,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

1986年10月,中心正式成立。此后,许多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从中心不断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获得国内外最新的科研信息,推进了国内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

(作者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原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

不畏权威,“硬刚”苏联教授

□ 王渝生

1952年,23岁的周光召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周光召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系讲师,并于1957年被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理论研究。

在195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29岁的周光召对一位苏联权威教授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会后,周光召废寝忘食,默默地研究了3个月,一步一步地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成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学术期刊《实验和理论物理》上。这就是世界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的问世过程。

1959年,苏联从中国撤走全部核专家,周光召致信当时的中国核工业部:“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家,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承担祖国下达的这项光荣任务。”

1961年初,周光召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实际上担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隐姓埋名近20年,专心致志研制原子弹和氢弹。

他和彭桓武等科学家艰苦奋斗,精心设计,严密测算,独立自主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又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白手起家,刻苦攻关。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周光召凭借其在两弹理论设计定型及研究试验中的成就,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关心青年,鼓励学术争论

□ 苏青

周光召讲到当时中国的学术气氛,如对权威的无端敬畏和盲目崇拜,不习惯学术争论、质疑。他寄语海外学者:“你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就少多了。希望你们中有人学成归国后,能营造一种新的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学术氛围,积极影响国内的学术环境。”周光召语重心长地补充道:“你们回国后可千万不要很快也被同化,那可就太糟糕了。”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周光召:热爱祖国,求真务实,关心青年,鼓励创新。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科学普及出版社原社长)

2007年9月27日,中国科协海外智力为国服务研讨会召开。在这次座谈会上,周光召希望海外学者多了解国情,站在爱护祖国、关心祖国发展的角度,多提着眼未来、考虑全面、科学合理的意见。他风趣地说:“其实,现在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最初也是采纳了‘海归’们提出的意见。比如,目前中国名牌大学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校长都是‘海归’,对SCI(科学引文索引)的膜拜不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吗?这种评价科研成果的指标体系一段时期起过好的作用,但现在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

2003年11月21日,主题为“后基因组时代的基因功能研究”的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第80次活动举办。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院士应邀出席。他刚走进会场,与会代表就纷纷以“副委员长好”“主席好”“院长好”打招呼致敬。周光召示意大家坐下后,遂严肃强调:“我们今天召开的是学术会议,这里没有副委员长,也没有主席和院长,只有教授、研究员、博士,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尽可能自由、平等地研讨问题。”

这就是周光召在学术领域给笔者留下的最初印象:平等、自由。在学术会议上,每个参会者都是平等的,都可以自由发言,周光召可谓率先垂范。

2007年9月27日,中国科协海外智力为国服务研讨会召开。

在这次座谈会上,周光召希望海外学者多了解国情,站在爱护祖国、关心祖国发展的角度,多提着眼未来、考虑全面、科学合理的意见。他风趣地说:“其实,现在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最初也是采纳了‘海归’们提出的意见。比如,目前中国名牌大学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校长都是‘海归’,对SCI(科学引文索引)的膜拜不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吗?这种评价科研成果的指标体系一段时期起过好的作用,但现在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

将“科学精神”引入科普政策

□ 刘立

百余年来,很多知识分子论述“科学精神”,但是把“科学精神”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等“四科”并列作为一个整体,并最终写入世界首部科普法,这个“优先权”,当归于周光召先生。

1994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专门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即《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传播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但未见“科学精神”提法。

1996年,全国首届科普大会召开,光召同志作重要讲话,并指出:“作为整个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科学普及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既包括介绍具体的科学知识,也包括普及科学方法,以及提倡科学态度和弘扬科学精神。”

在讲话最后,光召同志再次强调“科学精神”。他提出,科学工作者们,尤其是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们,还要努力普及科学方法,提倡科学态度,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以光召同志的讲话作为依据,笔者提出:周光召是把“科学精神”引入科普“四科”政策话语体系的第一人。后来,包含“科学精神”在内的“四科”,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国家顶层科普政策所采纳。

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正式提出“四科”,其表述是:要把科技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起来。

2002年,我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提出了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从此,“四科”便作为我国科普内容的标准表述沿用至今。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图为2008年6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典上,杨振宁、周光召、李政道(从左至右)参会。

视觉中国供图

题图为周光召肖像。 杜爱军 绘

